



“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杜润生著作的语言艺术

■ 白益民 山西省城市经济学会研究员



◆“1955 年底，加快合作化步伐，一些地区一步登天，从单干跳到高级社。”（《文集》第 3 页）

◆“有的是‘三头制’，牛头、人头、犁头；还有的是刀耕火种，手里一把种子，点一把火，再拿一把刀（或一根木头棍子）。生产力水平如此不平衡，搞一刀切，非失败不可。”（《文集》第 16 页）

◆“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把别人的平均过来容易接受，自己的平均给别人则会感到被侵犯，实行抵制和退出。”（《文集》第 13 页）

◆“过去是队长派工，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好像不是在自己劳动；实行包产后他真感到是为自己劳动了，所以安心生产了，用心生产了，放心生产了。”（《文集》第 74 页）

以上语言真实反映了农村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渲染夸张。杜老善于用群众的日常语言表达群众诉求，没有距离感，群众看了自然亲切，容易接受，感觉就像是自己身边的事情，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安心”“用心”“放心”，杜老用“民味”十足的语言把读者引向广阔的农村，是百姓生活和基层干部的思想真实呈现，给人以深深的思索。

另外，杜老还结合生活不断总结，在其著作中力求反映农村实践和发展形势的变化。比如：

◆“河南省的兰考县和山东省的东明县，属于长期落后、贫困的地区，是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穷县。”（《文集》第 20 页）

◆“和群众‘顶牛’，或者放任自流，都是错误的。”（《文集》第 55 页）

◆“包地出产量，包山坡绿装，包水鱼满塘，包厂厂变样。”（《文集》第 112 页）

◆“要打破某些老框框，不要自己竖起菩萨给它磕头烧香。”（《文集》第 121 页）

◆“实践肯定的东西，我们否定不了它；实践否定了的东西，我们也肯定不了它。这是历史的实践，群众的实践。”（《文集》第 300 页）

◆“凡文化都是经过‘杂交’的、多元化的。多元化的好处在于能够产生‘杂交优势’。”（《文集》第 524 页）

这些语言都是杜老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了杜老不仅“能说”，而且“会说”。语言贴近百姓生活，连续三个“靠”字生动说明过去管得死：“包地出产量，山坡披绿装，包水鱼满塘，包厂厂变样”，语言“大众化”、“口语化”，笔墨不多，化繁为简，诙谐有趣，琅琅上口，几句话就说出“包”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也是杜老自己的语言与群众语言“杂交”后产生的“杂交优势”，话有点土气却有生命力，通俗而富含智慧。博采百姓语言，从百姓语言中吸取营养，使他的作品读来总是那么鲜活生动。

杜老的著作一方面讲究语言通俗易懂，一方面还注意农村生产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他认为，“农民最受欢迎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适用新技术。”（《文集》第 1032 页）比如：

◆“办法是在饲料上做文章，办好饲料工业，降低饲料价格，同时开辟新的饲料来源，生产全价蛋白饲料，养一头猪能节约 50 公斤—100 公斤粮食，猪还能吃到足量的蛋白，瘦肉型猪 6 个月长到 85 公斤。他们利用秸秆、秕壳和树叶做原料，按一定比例配成培养料，利用微生物工程生产侧耳菇并可培养料转化为一定的菌糠饲料（据有关材料反映每百公斤培养料可生产 50 公斤—80 公斤侧耳菇，并能得到 60 公斤—70 公斤菌糠饲料）。事实证明，利用微生物工程，同时养蚯蚓、搞沼气池，形成可以循环利用的食物链，这是一种可能实现的设想。”（《文集》第 230 页）

这段话实际是农村养殖方面的科普知识，但杜老在文章中大胆使用，从技术层面说明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科学循环及经济效益情况，有刀过竹解的作用。杜老对农村经济（包括农村技术经济）的观察细致入微，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不深入农村，不了解农村，不接地气，杜老不会写出如此语言鲜活、好语如珠的

文章，他做到了理论语言与通俗语言的统一。在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中，像杜老如此大量娴熟使用群众生活语言，几乎没有。杜老堪称经济学界首创运用群众语言的第一人。

（二）摆账本：数据语言求真求实

杜老的著作中有大量经济数据，特别是农村经济方面的数据，他心中装有农村改革的“账本”。数据有全国的，也有省市的，更多的是一些县和村镇的数据。他反对用空洞的理论说服人，坚持倡导利用事实说服人。数据是反映事实的重要支撑，也是调查研究求真求实的内容之一。通过“算账”比较问题、说明问题，对经济问题的表述直观，“片言只语”的数据在其文章中显示出“此处无言胜有言”的力量。比如：

◆“全国农村共有核算单位 506.6 万个。据 504 万个单位计算，社员平均分配收入在 40 元以下的占 16%，50 元以下的占 27%，60 元以下的占 38%。50 元除去粮、柴草外，无剩余。人均口粮，旱粮地区在 150 公斤以下的占 19%，水稻地区在 200 公斤以下的占 18%。每个队 159 人计，共 1.5148 亿人。人均 40 元以下的最穷队，60%左右是分布于云、贵、鲁、豫、甘、宁、蒙、闽、皖等九省（区），约占农村人口的 20%。”（《文集》第 4 页）

◆“东明县 1958 年—1978 年 20 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 2.251 公斤，国家救济款和累欠国家贷款达 7800 万元。现在也有缺粮县变为余粮县。到目前为止，国家已收购粮食 3000 万公斤，花生 370 万公斤，芝麻 235 万公斤。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 1979 年为 31 元，1980 年连超产部分的收入计算在内，超过百元。全县农村的人均储蓄存款，1979 年为 3 元，1980 年达 17 元。”（《文集》第 21 页）

◆“以江苏为例，每 1 元人民币的收益率（每投资 1 元钱收回来的钱）：1957 年是 3.37 元，1965 年是 3.08 元，1971 年是 2.72 元，1980 年是 2.32 元。”（《文集》第 45 页）

这些数据看上去普普通通，也无特别之处。但杜老在文章中大量使用这些数据，目的就是说明农村的真实贫困状况，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现在，我们经济学界比较重视微观实证研究，对各种数据的应用非常广泛，大数据平台也比较多。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杜老能够广泛应用农村基层的经济数据做学术研究，实属不容易。

杜老尤其关注生产数据，主要是当时我国物资短缺，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吃不饱。在此背景下，“在研究各类生产数字时，一定要想到背后的经济利益问题，想到农民经济收入的变化。”（《文集》第 226 页）杜老的数据语言表面看虽波澜不惊，却内涵丰富，是实证研究和支

（三）讲技巧：政策语言和风细雨

杜老长期在农口工作，经历过几起几落。正是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起伏，使他对农业政策研究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政策语言不仅有极强的大局观，而且拿捏得恰到好处。“可以……可以……也可以”作为全国各界公认的“杜氏公式”，婉转而不生硬，宽容又包容，易于让意见不同的各方都能接受，成为“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表达方式——从情感上产生理解互信，唤起思想价值上的共鸣，形成改革发展的共识，使分歧得以弥合，有“小雨润如酥”之功效，成为其制定政策和解读政策的经典“语言”模式。杜老的政策语言艺术精湛而圆润，其政策语言运用得十分成功。比如：

◆“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把他们‘辩’回去了”（《文集》第 11 页）

◆“一方面把生产关系越拔越高，一方面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文集》第 15 页）

◆“现在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有的说好，有的说错，有的说危险，有的说不可怕，究竟怎么样？这关系到如何估计农民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动向问题，实有弄明白的必要。”（《文集》第 52 页）

政策方向需要辩论。但当时的情况，没有辩论的氛围。杜老是“宁愿搁下争论，做点向前看的事情”（《文集》第 1124 页）的人，故而用“把他们‘辩’回去了”，彻底摆脱了“阶级斗争”的语言色彩，“争论”而不“争斗”。“越拔越高”、“越绷越紧”，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框框”。他一贯提倡对农民只许说服教育，不准强迫，故而对“包产到户”，“有的说好，有的说糟，有的说危险，有的说不可怕”，一连四个“有的”，调侃口气浓厚，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包产到户”的思想还有分歧。怎么办？杜老认为“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的变化有不同的扶持政策。”（《文集》第 303 页）为了摆脱“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等“左”的干扰，杜老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在政策语言上尽量选择类似“责任制”的中性词，集中使用并力求简洁，有时一语中的，有时一语双关。比如：

◆“对 30 年的实践，要区别什么东西应该保护、发扬，什么应该批判、改革，什么先改，什么后革。而且要仔细地区分，越细越好。涉及人的问题，团结的人越多，基础越雄厚。……这些事情一开始搞得太细不可能，越往后越要细，越到具体单位越要细。这就叫把工作做细。”（《文集》第 59 页）

◆“关键在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清醒不清醒？是不是注意研究，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是不是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考虑问题，敢于进行新的实践？”（《文集》第 8 页）

◆“这个文件肯定了集体经济的方向，肯定了多样化，肯定了‘三靠’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肯定其他地方搞了不要纠、不要扭，要加强领导，这都是对的，这里面留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文集》第 62 页）

◆“我们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文件中，再次宣布集体化的方向是不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是土地公有制是不变的，搞生产责任制也是不变的，多样化的方针，也是长期不变的，有这么几个不变。”（《文集》第 62—63 页）可以看出，“越细越好”到“越要细”，“仔细”到“做细”，七个“越”字，六个“细”字，尽管重复使用，但感觉却十分人性化，委婉而不口嗦，以理服人而无空话。两个“是不是”后紧跟三个“敢于”，排比连串，节奏感强，使得语言设计有了一定的政策“冲击力”。而“文件肯定了集体经济的方向”，又连续三个“肯定”，把政策由“点”推向“面”。有了“肯定”，自然有了“不变”，为了从政策上说明不变，作者又进一步解释了五个“不变”，突出求稳，有效地增强语言的美感和表现力，读者读了“解渴”，听众听了“叫好”。

关于“开发性产业方针”，杜老说“不是简单禁止的方针，而是允许存在、因势利导的方针，允许活动的方针，加强管理的方针。”（《文集》第 88 页）杜老否定“简单禁止”后，怎么办？从管理者来讲，就是允许存在、允许活动的前提下，要因势利导，加强管理。用词生动而不生硬，四个“方针”一气呵成，在语言上增强了政策的指导性。杜老在语言上做到了“疏而不堵”，与他反对政策上的“一刀切”是一脉相承的。

杜老的语言联想丰富。联想中有思考，思考中有联想。有工作上的联想，有改革发展上的联想。比如：

◆“我们的调查研究要拉长线，不要只拉短线。有些材料是马上就要用的，有些材料是为以后使用准备的。我们要注意知识积累，建立‘知识库’，多储藏点东西，而不要办成简单的‘货栈’，今天进货，明天批发。它是一个‘仓库’，保存各种材料，随时备用。因此，调查研究要长期化、系统化。”（《文集》第 129 页）

◆“我们一定要把眼睛放在 100 亿亩可利用的国土上，搞立体开发，全面开发，念‘山海经’、‘山水经’，念‘草木经’。”（《文集》第 142 页）

又比如，杜老对“大锅饭”和“铁饭碗”有一段精彩论述。

◆“‘铁饭碗’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客观依据。改变它，要有一个分寸。‘铁饭碗’要反对，但没有一个饭碗，没有劳动权、就业权也不行，去掉‘铁饭碗’只能指改变干不干一个样的状况，至于饭碗总要有个。‘大锅饭’也要分析，不能说一反‘大锅饭’，连统一经营、经济联合一概不要了，那也不对。当然，也不能因为讲统一经营、经济联合，又恢复‘大锅饭’。反‘大锅饭’、‘铁饭碗’反什么，都要有分析，都要研究它产生的根据，才能反得恰到好处。”（《文集》第 130 页）

这段话如绵言细语，有发蒙解惑之效，从正反两方面将“大锅饭”和“铁饭碗”讲得非常透彻。语言简单，大道理中高度融合民生，又能充分说明问题。这里有语言技巧，也有分析技巧。杜老引申触类，把“大锅饭”延伸到“喝大锅水”。杜老的原话是：

◆“不能否定水利，但水的浪费和水的浪费不使用，不讲经济效益的办法要否定，特别是要否定‘喝大锅水’。”“节约用水，重要的一

条是要用水要有偿。这个‘偿’不是平均主义的。收水费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节约用水和合理用水，并不是单纯为了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用水有偿，才能杜绝用水上的‘大锅饭’。”（《文集》第 297 页）

“大锅饭”的弊端与“喝大锅水”的弊端是一样的。“大锅饭”行不通，那么，“喝大锅水”也不行。杜老批隙导窾，用改革“大锅饭”推动了“喝大锅水”的改革，自然流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要把技术效益、经济效益、规模效益、劳动效益几种效益综合起来观察、分析。”（《文集》第 301 页）从某种意义上说，五个“一号”文件的成功，就是政策语言的成功，是杜老表述技巧的成功——事半功倍的“语言效益”。

（四）巧融合：军事语言曲尽其妙

杜老是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的老革命，1947 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这样丰富的工作战斗经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军人的风格或痕迹。杜老下去搞调研必备一本中国地图，这是从战争年代过来习惯，行进途中随时看地图。杜老的讲话和文章，“兵”影随形。比如：

◆“‘吃大锅饭’，取消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搞军事共产主义。”（《文集》第 13 页）

◆“如果全国三亿多劳动力都聚集在十几亿亩土地上，那就会摆不开，像打仗一样，把兵力全部摆在一个阵地上怎么行，只能相对集中。”（《文集》第 75 页）

◆“而从这几年经历的事实来看，包产到户正是打破农业上‘左’的坚冰最有力的一击。”（《文集》第 80 页）

◆“这是一次短期演习，它使我们大家懂得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是不能跳跃的，离开生产力发展状况去任意改变生产关系会带来损失。”（《文集》第 94 页）

◆“农村改革如同军事作战一样，要在巩固既得阵地的同时，乘机扩大战果，争取主动，创造优势。”（《文集》第 313 页）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要联合作战，打开灭战，因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研究人员少，更要注意协同作战，力争有所创新。”（《文集》第 1128 页）

杜老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不少军事语言，就会产生“冲锋陷阵”的影响意义，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军事共产主义”也称“战时共产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在 1918—1920 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在市场之外建立起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使苏维埃俄国迅速形成了严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战争结束后，该政策与平时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社会动荡，1921 年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杜老把“吃大锅饭”等同于“军事共产主义”，既有苏俄历史的失败教训，也有我国“吃大锅饭”的真实弊端。“军事共产主义”一词用得自然又贴合实际，融入得精妙。一句“像打仗一样”，把兵力全部摆在一个阵地上怎么行，引出了“战斗力”与“生产力”的异曲同工之妙。“把兵力全部摆在一个阵地上”，看似兵力多，实际没有战斗力。“全国三亿多劳动力都聚集在十几亿亩土地上”，劳动生产率低，自然就难以提高生产力。“农村改革如同军事作战一样，要在巩固既得阵地的同时，乘机扩大战果，争取主动，创造优势。”就是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必须扩大战果，争取主动，否则就可能出现反复。这种军事语言与经济理论文章的结合，为我们展现出农村改革需要“军事谋略”的科学运筹，体现了杜老作为“总参谋长”之多谋善断的非凡智慧。

从语言结构看，不罗嗦，多短句，少长句；多单句，少复句。难能可贵的是，杜老把军事语言巧妙地融合在经济理论文章中，读起来非常顺口，更易于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样的灵活运用，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还是不多见的。这也是杜老的语言特色之一。

我们还注意到，杜老还在著作中的标题使用过军事语言。他在《心中有条大黄河》一文的小标题分别是：（一）接受挑战；（二）初战成功；（三）扩大战果，争取全胜。文章是为山西省原政协主席郭裕怀著的《摸着石头过黄河》一书写的序言。山西是杜老的故乡。山西缺水，除了向黄河调水，别无选择。杜老为故乡着急，在九十多岁时还处心积虑为山西引黄济晋工程呐喊，反映出的是老“兵”精神——“人在旗在，人在阵地在”。无论年龄多大，“军魂”永驻杜老心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五）求创新：学术语言辞简义赅

杜老对农村改革的贡献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这个理论获得首届“经济理论创新奖”。杜老的学术前瞻性超强，学术创新与学术语言相得益彰，特色主要体现在用词讲究，语句短小，层次分明而严谨。比如：

（下转 03 版）